

中国教育通史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2

先秦卷(下)

施克灿
谭佛佑
梅汝莉
本卷主编

阎国华
李国钧
王炳照
总主编

顾明远
学术顾问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教育通史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2

先秦卷
(下)

施克灿 谭佛佑 梅汝莉 本卷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通史·先秦卷(下)/梅汝莉,谭佛佑,施克灿主编.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8
(中国教育通史/王炳照,李国钧,阎国华总主编)
ISBN 978-7-303-16504-9

I. ①中… II. ①梅… ②谭… ③施… III. ①教育史—中国—先秦时代 IV. ①G5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2945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9014
北师大出版社教育科学分社网 <http://jyxx.bnup.com>
电子信箱 jiaoke@bnupg.com

ZHONGGUO JIAOYU TONGSHI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 mm × 260 mm
印 张:27.5
字 数:306 千字
版 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38.00 元

策划编辑:郭兴举	责任编辑:郭兴举
美术编辑:纪 潇	装帧设计:蔡立国
责任校对:李 菡	责任印制:陈 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 顾明远

总主编 王炳照 李国钧 阎国华

修订工作组组长 田正平

修订工作组成员 田正平 金林祥 俞启定 于述胜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述胜	马 镛	王建军	田正平	乔卫平
刘 虹	宋大川	吴宣德	苏渭昌	金林祥
郭齐家	俞启定	施克灿	顾明远	梅汝莉
雷克啸	熊贤君			

总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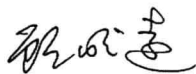
《中国教育通史》即将付梓。首先我要向田正平、俞启定、金林祥、于述胜以及参加这次修订编纂工作的学者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不辞辛苦，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完成这部巨著。

《中国教育通史》是将 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的王炳照、阎国华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8 卷本）和王炳照、李国钧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8 卷本）合编而成的。原来两部著作是三位教授的力作，本来由他们合作主持合编修订中国教育通史是最合适、最理想的，可惜李国钧、王炳照两位先生都先后离世，阎国华先生年事已高，于是由田正平负责的修订小组接手完成，原作者都基本上参加了此次修订工作。

王炳照、李国钧、阎国华都是我的朋友，我们曾经多次合作过。我主编的《中国教育大系》中《历代教育论著选评》和《历代教育制度考》两大系列就是王炳照、李国钧两位编纂的。阎国华则参加了我主编的《教育大辞典》的工作。李国钧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史学，特别是研究中国教育制度史的权威，不仅著作丰硕，而且培养了一批人才。阎国华先生是河北大学教育史教授，兼通中外教育史。王炳照则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是我的同事，我对他有更深的了解。他先后主编了《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等专著，又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编纂工作。他对我国古代私学、书院和科举制度又深有研究。他不仅研究中国教育通史，而且拓展了区域教育发展史的研究，并且对教育史学也有较深的研究和独特的见地。

王炳照、李国钧、阎国华是我国教育史学界承上启下的人物，他们师承舒新城、孟宪承、毛礼锐、陈景磐、沈灌群、滕大春等老一辈教育史学家，“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们接过这批老先生的班，开拓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他们坚持教育史研究中“古为今用，以史为鉴”的史学原则，探寻中国教育思想产生、发展及其演进的历程，挖掘历代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总结前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揭示教育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研究中国教育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史，回答教育制度作为一个历史存在物的存在特性，及其与现实存在的教育制度之间的关联，探讨现代教育问题的历史根源。

《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和《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是两部巨著，各有 300 多万字，把两本书合并起来，编纂成一部《中国教育通史》，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田正平、俞启定、金林祥、于述胜几位教授主持下，原作者的积极配合下，经过对两书的合并、调整、修订、创新，终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最完整的中国教育通史。这部书的出版，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一是，这部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教育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二是，标志着我国新一代教育史学家的成长，因为参加修订工作的大多是各校中青年学者。李国钧、王炳照、阎国华开展了中国教育史研究承上启下的工作，现在后继有人，值得他们欣慰了。



2013 年 3 月 6 日

本卷导言

本卷承接先秦卷（上），撰写了战国时期我国教育史上纷繁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内容。

战国时期，各国先后完成了封建化的进程，为了寻求更为合适的治国安邦之道，使春秋以来的“养士”之风愈演愈烈。这就为士阶层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基础，一时之间，学派林立，处士横议，儒、墨、道、法、纵横、农、兵、名、阴阳家等诸子百家竞相在战国这个历史舞台上亮相，他们站在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立场上，相互争鸣，而又相互吸收、补充，写下了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诸子百家学术思潮的勃兴，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教育思想发展的高潮。

孔子以后，至战国儒分为八。实则最关键、最具代表性的是“思孟”一派与荀子一派。他们各承孔子学说之一端，或吸收百家之中的有关思想，建构自己一派的教育思想体系。“思孟”学派以孟子最有影响。他重点继承孔子的“仁”的思想，从人“性善”出发，从“内”入手，主张教以“明人伦”，强调人的主观内在修养，完美人格的塑造，建构了完整的中国古代高尚人格的教育思想体系；荀子则以人“性恶”为基点，从“外”入手，承孔子的“礼”的思想，融入“法”，播学传经，力主“化性起伪”，“制天命而用之”，学为“圣人”。

儒家教育思想在自身分化及融合其他诸家之后，又呈现整体融合的趋势。至战国晚期逐步成书（至汉最后编定）的《礼记》，作了一次全面的综合性的总结。从教育制度理论思想的建设，到家庭教育的论述；从教人做人的“格、

致、诚、正”道德修养思想的发展完善，到“修、齐、治、平”理想人格的社会投入与实现；从完整的教学思想体系的设计，到论师生在教育活动中的作用地位；最后从更高的理论层次，总结了教育这一社会现象在培养人和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崇高地位以及巨大的作用和功能，完成了中华民族古代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教育思想体系宏伟大厦的最坚实的基础建设。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的思想，包括其教育思想，历来被认为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有与儒家互补的作用。老、庄都反对儒家的礼教，他们主张“绝圣去智”，用“不言之教”“不教之教”去培养以超越态度寻求在现实中的解脱，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人格。他们并没有去改造儒家的礼教，反而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另辟了一条寻求超脱而求得心理平衡的“新路”。道家建构的教育培养人的修养方法和教学方法，具有一定的辩证法因素，有力地促进了人们思维的发展。

法家的教育思想与诸子各家不同。他们的思想在于变革用世，没有主张建立完整的培养理想人格的学校体系。法家尤重功利，贵事功，重赏罚，讲参验，因而也提出了与其他各家颇多契合且具有唯物辩证法因素的教学方法论。法家的教育思想与墨家的教育思想一样，都没有成为封建时代教育的主体思想。

先秦诸子百家中，除儒、墨、道、法四家外，还有诸如兵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货殖家等。他们在先秦“百家争鸣”中，都是以独立的学派出现，都有自己学派的代表人物和聚徒传学的活动。各派也总结了自己学派教育实践活动具有本学派特点的经验，在“争鸣”中也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逐步上升为一定的教育思想理论。这是先秦教育思想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部分教育思想的研究，可以说是对以往先秦教育思想史研究的“补白”。

兵家以孙武、吴起、孙臆以及《孙子兵法》《尉缭子》《六韬》《司马法》等军事家或军事著作为代表。他们的军事教育思想的主要观点基本一致，都主张教战，培养将帅，教训士卒。“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教百姓而亲万

民”。他们还总结了“智、信、仁、勇、严”五德并举的军事人才培养目标，以及最具辩证法思想的军事教育斗争的原则方法，这对后世影响极大。兵家的战略和谋略思想，又分别被货殖家和纵横家所接受。货殖家又称商家，也是先秦诸子中的一家，白圭被视为祖师，范蠡是主要代表。他们研究商业经营的“富家”“治生”之术，培养经营人才或传学子孙。规定以“智、勇、仁、强”为条件授徒传学，皆承儒家德行教育的基本思想。至于纵横家，战国时最为活跃，以苏秦、张仪最为有名，他们都师承鬼谷子，学“纵横”之术，后游说列国，以“时势”和“权谋”为说教的中心，总结了一套长于权变、辩证灵活的“说人之法”、论辩之术，在现今的各种交谊与教育活动中，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名家和阴阳家，被司马谈认为是先秦诸子最著名的“六家”中的两家。名家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以论“名实”、施教逻辑思辨而风行于世。阴阳家又称阴阳五行家，以出自齐国稷下的“三邹子”：邹衍、邹奭、邹忌为代表，而以邹衍最为有名。阴阳家主要传学以五行相胜、五德终始为宗，论学的方法又以辩学逻辑类推为用，很类似墨、名两家教辩的基本内容。

3

先秦诸子百家中，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他们的教育思想所反映的政治目的都各不相同，反映在教育上，儒家重理性，主致用，讲启发；墨家重实践，主工艺，讲事功；道家尚直觉，崇思辨，论辩证；法家尚法制，重赏罚，因参验。总的说，他们都在着重追求对人的培养以实现对现实人生价值的实现，只是各家所施之内容和某些途径不尽相同而已。有意思的是，墨、道、法三家都反对儒家的“仁义”或“礼乐”之教，有时其攻讦之尖锐，言辞之激烈，可谓“敌对”。但更有意思的是，谁也没有能将其“打倒”，而使自己学派的教育思想居于主导地位。相反，其他各家的许多思想却被儒家所吸收兼容，而其他各家在对儒家“攻击”之余，自觉不自觉地也在吸收兼容儒家的东西。这也说明，儒家教育思想的博大精深，有大海归纳百川的恢弘气势，在体现教育最本质的问题——培养人、教人做人方面，充分显示了它的完整性。正是由于儒家善于吸收融合其他各家的思想，从而达到了丰富多彩、全面完整的卓越水平，致使其他任何一家也不能与之

相比，并具有特别适用于统治者办教育所需要的丰富的思想理论，它的现实意义和“经世”的价值，也是其他各家所难于企及的。不论后世汉儒的“改造”，唐代大儒恢复其“道统”，宋明理学将其“转折”“发展”，其归宿只有一点，都是加强了它在教育思想上的主导统治地位，不断增强了其“经世”的现实性和实用价值，这就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总体发展的逻辑趋势。

本卷书稿执笔人：本卷导言——谭佛佑、施克灿；第一章——施克灿；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谭佛佑；第五章——梅汝莉、施克灿；第六章——王炳照；结语——王炳照；参考文献——梅汝莉、施克灿、谭佛佑。

目 录

第一章 战国时期教育制度概述/1

第一节 儒家经籍教学体系的成形/2

一、从孔子到荀子：儒学经籍的传授体系/2

二、儒家经籍内容体系的成形/7

第二节 百家争鸣与各家私学的发展/14

一、百家争鸣之源/14

二、儒、墨私学的分化/18

三、道、法学派的兴起/20

第二章 战国时期儒家教育思想的变迁/21

第一节 孟子对儒家“教人做人”思想的弘扬与发展/21

一、对孔子“教人做人”思想的弘扬/22

二、“明人兽之别”的论述/24

三、创立人格教育的论述/27

四、人格教育的基本结构/30

第二节 孟子论教学与德育的基本思想/39

一、对教学原则和方法的论述/40

二、伦理道德教育的基本思想/49

第三节 荀子的教育思想/60

一、论教育对人的作用/61

二、论教育的培养目标和人才的取用/65

三、论道德修养的教育思想/72

四、论教学的基本思想/81

五、论教师与师生关系/87

第四节 荀子对儒法教育思想融合的贡献/92

- 一、多规格多层次的培养目标/92
- 二、隆礼与重法相结合的教育思想/97
- 三、学思行结合：教学方法论的贡献/102

第三章 《礼记》综合儒家各派的教育思想/107

第一节 《礼记》对古代教育制度的总结/107

- 一、对学校体系和学制建设的论述/108
- 二、对视学典礼和养老制度的论述/112
- 三、对学校奖惩制度的论述/115
- 四、对考核升级选任制度的论述/116

第二节 《礼记》论早期教育的思想/118

- 一、论早期教育的基本过程和内容/118
- 二、论早期教育的择师及其条件/121
- 三、论早期品德修养和行为礼貌教育/122

第三节 《礼记》对儒家教育基本理论的总结/126

- 一、论教育的作用和目的/126
- 二、论教育与人的关系/130
- 三、论教学认识过程的知行观/134
- 四、论仁、义、礼、乐之教的巨大作用/138

第四节 《礼记》对儒家教师论的理论总结/143

- 一、论教师的地位和作用/143
- 二、论儒者（教师）的独立人格/146
- 三、论儒者教师的职业意识与道德修养/148
- 四、论教师的智能结构与师生关系/152

第五节 《学记》的教学思想/156

- 一、《学记》的作者及其成书/156
- 二、论教与学成败的关系/159
- 三、论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关系/163
- 四、论教学的原则和方法/166

第四章 战国时期道、法、兵、阴阳等学派的教育思想/178

第一节 老、庄和道家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178

一、老子与道家教育思想的形成/179

二、庄子与道家教育思想的发展/193

第二节 韩非与法家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209

一、法家先驱与法家教育思想的形成/210

二、韩非与法家教育思想的发展/225

第三节 兵家的军事教育思想/244

一、论富国强兵、教战爱民的思想/245

二、为将之道的教育思想/248

三、训卒教士的基本思想/252

四、军事教育的辩证原则/255

第四节 阴阳家与纵横家的教育思想/259

一、阴阳家邹衍的教育思想/259

二、纵横家的教育思想/269

第五节 名家与货殖家的教育思想/281

一、名家的教育思想/281

二、货殖家的教育思想/291

第五章 稷下学宫及教育思想的争鸣与交融/300

第一节 稷下学宫的兴建/300

一、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300

二、学宫创办渊源/303

第二节 齐文化与稷下学宫/307

一、齐文化的形成与表征/307

二、稷下学宫的兴学思想/309

第三节 稷下学宫的教育思想争鸣/313

一、教育思想争鸣的内容/313

二、稷下学者争鸣的原则与艺术/328

第四节 兼容各家的稷下教育思想/332

一、具有首创性的教育价值观/333

二、稷下黄老精气说与德、智、体统一论/336

三、道、德、法、智融合的教育思想/338

四、丰富和扩大教育内容的思想/343

五、兼容德法的社会教化思想/352

第六章 杂家的出现与先秦教育思想百家争鸣的终结/361

第一节 先秦诸子教育思想的分化、融合与杂家的出现/361

一、先秦诸子教育思想的分化/361

二、先秦诸子教育思想的融合/369

三、杂家的出现/377

第二节 先秦教育思想百家争鸣的终结——《吕氏春秋》的教育思想/385

一、《吕氏春秋》的成书及其特点/385

二、《吕氏春秋》的教育思想/395

4

结 语/414

人名与专业术语索引/418

参考文献/420

第一章 战国时期教育制度概述

战国时期，经过争霸战争，先后出现了七个较为强大的封建国家。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寻求更为合适的指导思想，各国统治者竞相养士用士，使春秋以来的“养士”之风愈演愈烈，这就为士阶层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社会基础。一时之间，学派林立，处士横议，儒、墨、道、法、纵横、农、兵、名、阴阳家等诸子百家相互争鸣，又相互吸收、融合，写下了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而诸子百家借以扩大影响、势力的中心阵地便是他们创办的私学。

诸子私学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4家。自孔子死后，儒家分为众多学派，在他们的努力下，儒家以《五经》为主的经籍教学体系逐渐成形；墨家学派也十分活跃，一度达到了与儒家相抗衡的水平；道家私学虽不如儒、墨家之兴旺，但以其深远的思想和哲学体系，与儒、墨鼎足三立；法家学派则异军崛起，短时间内就以其“霸术”思想得到各国统治者的青睐，对战国末年的社会发展以及秦王朝的统一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齐国的稷下学宫是战国各家私学的汇集地，它不仅为“百家争鸣”提供了一个集中的场所，而且还促成了诸子百家的发展、融合和分化。稷下学宫创办之早、历时之长、规模之大以及其独特的办学模式，堪称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典范。

第一节 儒家经籍教学体系的成形

儒家经籍除《诗》《书》《礼》《易》《乐》《春秋》外（后《礼》分为三礼、《春秋》分为三传，演化为“九经”），还有《论语》《孟子》《孝经》《尔雅》，这 13 部经籍在封建社会被奉为神圣的“经典”，是头等重要的古文献。本节着重谈儒家经籍传授体系与儒家经籍内容体系两个方面。

一、从孔子到荀子：儒学经籍的传授体系

在孔子以前，儒家“六经”是存在的，并且自春秋以来，很可能已经由当时的文化官吏作为“文教”的材料。《国语·晋语七》记载晋悼公采纳司马侯的建议，“召叔向使傅太子彪”，司马侯说叔向“习于春秋”（时孔子尚未修《春秋》）。《国语·楚语上》亦载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云：“教之春秋”“教之世”“教之诗”“教之礼”“教之乐”“教之令”“教之语”“教之故志”“教之训典”等。叔向所习、申叔所教之《春秋》，当是晋、楚国所编的史书。礼、乐在西周时就列为“六艺”之首，至于《诗》《书》，在孔子以前的一些贵族的言论中也常常引用，他们所以能熟悉《诗》《书》，未必是无师自通。《易》在西周是占筮的书，春秋时 also 颇流行。《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子服惠伯曾较详细地解说一次占筮的爻辞，且说，“吾尝学此矣”。孔子学《易》，韦编三绝，更表明此书的存在。至于《春秋》本为鲁国史，韩宣子适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①。这些史料均出现于孔子之前，当时学在官府，图书典籍藏之于官府，可能是用以教育贵族子弟的，但显然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教育。

^① 《左传》昭公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4），第 1226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孔子创办私学后，在教学中可能已经使用了这些古代典籍。周予同先生认为：“孔子既然设教讲学，学生又那么多，很难想象他没有教本。……《论语》记载孔子十分留心三代典章，指导学生学习《诗》《书》及礼乐制度。因此，我认为，孔子为了教授的需要，搜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文献，重加整理编次，形成六种教本：《易》《书》《诗》《礼》《乐》《春秋》，这种说法是可信的。”^①

这并非主观臆断，可以从其他文献中找到旁证。《墨子·公孟》云：“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这里没有讲到《易》《春秋》，因为此两书是孔子晚年才开始研究并整理的，而且内容也比较精深，只有少数弟子才能研习，故司马迁又说：“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②司马迁素以着笔严谨著称于世，他在此处以“六艺”称之，是十分准确的，西汉时这些典籍虽已称为“经”，但在孔子时代确实没有如此高的地位，而且也尚未构成体系。

这6部书并举，被称为“经”，始于《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熟知其故矣。’”但事实上，“六经”之名，不可能是孔子所自称（《论语》中从未出现）。《天运》在《庄子》中属“外篇”，并非庄子亲作。不过，此后的诸家著作，常常是“六经”或“五经”并举，如《荀子·儒效》《商君书·农战》《礼记·经解》等战国晚期著作，均称之为“经”。经学教育已被普遍承认为儒家教学的标志，儒学也与墨学并称为“显学”。因此，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从孔子整理六经到战国末期荀子传授儒经，儒家经籍教学体系已初步成形。

在传经方面作出巨大贡献的是孔子弟子子夏及其所创立的“西河学

^① 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第34～3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② 《史记·孔子世家》。